



《人类与他们的钟》，220 x 340 cm，油画，1986 年作（首届上海青年艺术大展一等奖）

张健君： 创作是未知的，我们过二十年再看

The Value of Creativity is Proven through Time

文 索菲 编辑 张梦

张健君去了美国后，早期的抽象艺术越做越大，从墙上落到地上，变成装置和雕塑。

不同地域的生活经验让他的作品回归自我感悟的状态，他说“随机随缘就好”。

和平鸽和传真机

1995 年，原子弹爆炸 50 周年，张健君作为受邀艺术家参加日本广岛的一个国际大展。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张健君做了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作品。在纽约大街上、在联合国、在学校、在朋友的派对上，甚至在戒毒所等所有可能的地方，他去找不同国家的人，请他们画一只和平鸽。人们每画完一个和平鸽，张健君就把一枚代表他们国家的旗帜贴到和平鸽上，而参与这一项目的人身份各异，有流浪汉、教授、军人、游客等。

在长达 3 个月的准备过程中，有两位“临时画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华盛顿广场，张健君邀请一位来自某个太平洋岛国的路人来画一只和平鸽，想不到对方画了一个圆，再写上“LOVE”（爱），他说我没法画鸽子，这就是我的和平鸽。张健君当时已经收集了 160 多个鸽子图形，这是唯一的一个圆。等这位路人画完后，转身给了张健君一个小包，说：“和平很好，毒品也很好。”时隔 20 多年回想起来，张健君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毒贩代表着社会恶的一面，但人性在心底里，还有善的可能性。”

图片 张健君提供

另一次在中央公园，张健君找到一位牧师，他听完张健君的创作意图后说：和平鸽只有一只，是上帝的，哪有几百只和平鸽？但牧师被这个想法所打动，最后他还是画了一只。等到展览那一天，用了 2 台传真机，瞬间把张健君准备了许久的作品从纽约工作室传送到广岛纪念公园的广场上，其中 1 台传真机放在立柱上，立柱下面是一个用灰烬铺成的圆坑。张健君把所有和平鸽按照国家顺序排列起来，从纽约发送到广岛的传真机上，那些和平鸽被打印出来后陆续地在空中飘了 2 个多小时。项目并没有就此结束，张健君收集所有和平鸽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关于这个作品的录像和照片，而后参加了美国和德国的美术馆文献展，并收到了来自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纽约市长办公室的褒奖信。

对话张健君

《胡润百富》：近期您有哪些办展计划？

张健君：近期举办的展览有 4 个，分别在美国、比利时、荷兰，还有上海中华艺术宫的“吴语·方言”展。明后年，我还有几个美术馆的展览和收藏展的项目：在印尼巴厘岛开幕的余德耀美术馆，新馆的雕塑公园会有我的大型雕塑和室外雕塑装置。然后在西安华侨城美术馆 OCAT 有一个大型个展，展出的作品将会与中国的、西安的文化历史的变迁发展有关，将会是雕塑装置以及与参观者互动的形式。另外还有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的展览。

《胡润百富》：您早期学习油画，现在的创作方向却完全不

面向未来的回归

2005 年，有了在中西方的生活经历后，张健君的作品回到了一种自我感悟的状态，用他朋友的话来说就是“面向未来的回归”。张健君思考如何连接当下和中国传统文化，并由此创作了流水系列、第一滴水等作品，其中和音乐家、诗人的互动合作都是未经过排练而产生的瞬时效果，这种非确定性的、非事先预设好的状态，他将之定义为“随机随缘”。谈到未来的创作方向，张健君说：“我觉得材料无所谓，重要的是把聚焦的内涵、心境展现出来。我会去重新看待一些我欣赏的传统方式，或回到手工的方式，也有可能仍继续做互动的作品。如今互动好像很时尚，但我的互动作品在 20 世纪 90 年代，20 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是未知的，我们过二十年再看。”

一样，中间经历了哪些转变？

张健君：1979 年我刚毕业，去了永乐宫、龙门石窟和敦煌这 3 个佛教道教的圣地，我当时学油画学的是焦点透视、再现现实，而面对佛教道教那些洞窟艺术，你会发现，它们虽然是平面的，但它是往内心走的，它直接撞击你的内心，当时冲击很大。我在上海长大，当时上海就是比较西化的城市，所以不太会去关注一些很中国化的东西。那一年的经历后，让我有了非常强烈的改变，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元素，作品开始从斑斓的色彩转到黑白，并使用自然界的材料——石、木、纸，然后在画布上做综合材料作品。后来，我去了美国，早期的那些抽象艺术越做越大，从墙上落到地上，变成装置和雕塑。



《山·水》，250 x 700 cm，水墨、油彩、宣纸、画布、硅胶，2016 年作



张健君

艺术家，纽约大学教授。出生于中国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1997 年起任美国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近年开始教授于上海纽约大学。

图片 张健君提供